

新乡贤出场的三重要求及生成路径

韦统义, 苏佳敏, 吴明远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安 710071)



摘要:乡贤是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是乡贤活跃的深厚土壤。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以及近代国家权力逐步介入农村,乡绅(贤)逐步从乡村治理中退场。新乡贤出场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即近代以来乡村精英长期的单程流动,导致乡村内生性建构力量不足;面向后喻文化时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各种乡村精英协同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从质和量两方面破解乡村精英不足的瓶颈,构建新乡贤出场的平台。新乡贤是开放的精英群体服务“三农”不可或缺的力量,其本质既是知识创造价值的时代体现,也是能力本位的时代体现。

关键词:新乡贤;乡村治理;乡村精英;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G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0)04-0075-07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1]。这是继2015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的政策主张之后,再次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面加强“三农”队伍建设的战略主张。乡贤作为中国传统农村自治的内生性权威和秩序维护力量,时隔60多年再次出现在国家乡村治理的文件政策中,反映了这既是乡村自治内生性秩序生成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激发乡村内生力量推进乡村振兴的需要,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尊重规律和尊重现实的需要。

前喻文化^[2]时代是乡贤在乡村治理活跃的时期。

由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财政资源不足及国家治理技术有限,导致国家政权无法深入到广大的乡村。为获取财政资源、维护政权稳定以及维持乡里秩序,封建国家通过官绅共治实现上述目的,即国家权力结合乡村的内生权威——“非正式规则”权力实现国家意志。乡绅的出场就是这种治理逻辑的体现。乡绅作为农耕文明时代的文化知识权威,在乡村发挥着传播教化、垂范乡里、周济乡民和化解纷争的积极作用,由他们传播时代的正能量和正价值而齿德并茂和群情所归,他们也被谓以乡贤。在科技教育落后、社会知识进步缓慢的前喻文化时代,乡贤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和乡村社会生活的中心。随着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和国治完整的要求,国家权力开始不断深入乡村,乡贤治理乡村的空间被不断压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实现工业化,国家权力全面介入乡村,乡村治理主体和治理权力的更替成为必然,乡贤作为前喻文化时代乡村治理的主体正式退场。随着乡村自

治的深入,乡村内生秩序力量的生成需要成为当务之急,近年乡贤作为乡村的内生力量和传统文化资源被再度引入。但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乡村振兴战略所建构的乡村,既是对前喻文化时代乡村精神的传承,又在不断开拓和发展着乡村现代化的新质,作为前喻文化时代的乡贤显然不能以简单的“返场”形式在场,新乡贤的出场已是时代之约。

二、新乡贤出场的三重要求

(一)近代以来乡村精英的单程流动导致乡村内生性建构力量的不足

近代中国遭遇的发展型危机对乡村产生了严重的冲击^[3]。为解决乡村危机,一批知识分子主张和当时的政府合作,对乡村进行社会改良,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在山东邹平、河北定县以及江苏江宁的改良对当地农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最终却呈现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境况^[4]。乡村不动,有日本侵略导致的难以以为继的原因,也有乡村内生建构力量不足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的危机是人才和资源单程流动的危机。近代中国的危机和乡村的凋敝,有来自外部冲击和剥削的因素^[5],更是因为近代以来城乡发展落差扩大和工占农利的制度设计,导致各种资源从乡村向城市长期的大规模单程流动。正如周谷城的分析:“农村中的现金由土豪地主直接送到都市上的工厂里或银行里……这是使农村崩溃之一法。再者都市上工厂一天一天的增设起来了,农民渐渐由农村向都市上跑。……,这是使农村崩溃的又一法。”^[6]资源流向城市只是概括性的说法,从更为细节的层面看不仅有资金单程流动,还有大量乡村精英的单程流动,他们的离去深刻地影响了乡村内生权威的结构和稳定。

近代乡村精英的流失具有时间上的不间断性,这是导致乡村内生权威和秩序建构力量不足的关键原因。在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乡绅和乡贤依据其知识霸权和道德文章自然而然地成为乡村社会的中心和自治的主体。而1905年废除科举从政治层面断绝了乡村精英向上层社会流动的路径和空间,随后国

治完整的国家政权建设又使他们在乡村中失去了原有的话语中心位置,乡绅(贤)开始退出乡村。其后,国家内卷化发展造成从财政危机到国家危机的不断深入,乡村负担越来越重,完成这些苛捐杂税的确需要一些“狠角色”,乡村治理主体从保护性经纪到营利性经纪的转变,使得乡村治理的劣绅化就具有必然性^[7],成为垂范乡里的道德乡绅(贤)加速退出乡村的加速剂。新中国成立后,乡绅作为旧时代的非正式权力彻底退出乡村治理。

服务于工业化的教育制度加剧了乡村精英的单程流动。王先明认为,一方面近代中国教育格局的变迁,导致中国教育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大量农村精英在接受新式教育后离开农村^[8];另一方面新式教学内容与乡村社会需求疏离,新学教育的课程内容是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求的,尽管新学中有农林科教育,但毕业生中真正服务于农业和农村社会的却很少。也就是说,新式教育培养的人才对于农业社会来讲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8]。乡村内生精英的流失,叠加新的乡村精英供给不足,乡村建设很难推进。如山东邹平开展乡村建设时,必须要在乡村建设研究院中设立研究部和训练部,培养招收大学毕业生或相当学历者,使他们成为培养乡村工作基层干部的骨干^{[9]267}。晏阳初则要把中华平民教育会总会从北京迁到定县多方培养乡村建设的骨干^{[9]306}。乡村建设精英生成的实践表明,完全依靠乡村内生精英完成乡村社会的振兴,不仅存在乡村精英数量上的不足,也存在过往的乡村精英质上的不佳。

新中国成立后,为快速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权力开始深度介入农村,并通过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制度将工占农利转化为工业化积累。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对乡村资源从推拉两个方面形成合力,加剧了城市对乡村资源的虹吸,乡村精英和能人更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流入城市。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逐步调整国家发展战略,继在推动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适时全面启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展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在上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惠农政策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2017年又推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些国家层面的战

略调整,初步改变了自近代以来的乡村资源向城市的单程流动。特别是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提乡贤的回归,从而将激发乡村内生建构力量实现乡村振兴的要求提上日程。这项政策的提出,既体现了国家对乡村内生建构力量认识的转变,也表明现有乡村精英力量的不足。

(二)面向后喻文化时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各种乡村精英协同推进

当代中国已经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转变,广大乡村也正从前喻文化时代、并喻文化时代向后喻文化时代转变^[10]。这种转变体现在乡村社会,就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我国的乡村工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多维发展,对乡村精英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乡贤的出场既是对传统乡贤的扬弃,也是适应后喻文化时代乡村社会全面进步发展的需要。乡村权力结构和话语权权威扁平化的发展为乡村各种精英协同推进乡村发展提供了条件,也深化了新乡贤的内涵。

乡村建设运动对传统乡贤的扬弃孕育着新乡贤的因素。在前喻文化时代的中国乡村,作为乡里的知识权威和道德权威,乡贤主要承担教化民众、周济乡亲、解决乡间纠纷并维系乡间秩序、组织乡村公共事务建设等功能,“非生产性”特征显著。正如罗兹曼对培养前喻文化时代的乡绅的旧式教育的定位,“符合社会地位的知识与熟知经师哲学联系在一起,而与提高生产率或效益的关系不大,以致文化教育不仅被学者所看重,也为农工商所看重”^[11]。基于前喻文化时代乡贤的“非生产性”,以及从生产发展层面对乡村衰败的挽救,乡村建设运动在具体实践中并不是让那些前喻文化时代的乡村精英简单“返场”,重新回到乡村社会的中心,而是让受旧式教育的贤者与受新式教育的贤者组合^[12],受新式教育的人物成为乡村建设的支柱^[13]。邹平经验如此,那么定县和江宁的实践又怎样呢?定县自治发轫之始,先是效仿日本乡村的建设,后期则主要由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总会倡导并践行^{[9]214-216}。至于江宁的实践,不仅在乡村的社会治理层面有对后喻文化时代的治理技术和治理装置的多重借鉴^{[9]355},更表现在农业生产领域对西方的

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有着更深层次的学习和运用^{[9]367}。乡村建设运动尽管无法从根本上挽救中国乡村的衰败,但他们的实践对后世有深刻的启发意义。特别是其对于前喻文化时代的乡村精英和礼俗秩序既不是简单的移用,也不是简单的推翻,而是既有人员和精神上的借鉴,也有结合新式文明的特质进行的再造和扬弃^{[9]277-278}。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已经孕育着不同于传统乡贤的新因素。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多元发展是新乡贤出场和活跃的平台。从城乡关系看,近代中国的发展是从传统的农村中心起步,到近现代的城市中心,再到当前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尽管当前我国存在着城乡发展不协调和不平衡的问题,但市场化和工业化已经将广大的农村纳入到广泛的社会分工体系中,只有发达的农业和繁荣的农村才能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发展动力。乡村振兴和发展的意义,已上升为国家发展的全局战略。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这种面相的乡村,是建立在精准农业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农业农村信息生产、信息加工和信息传播的价值链,也是建立在个人权利觉醒基础上的新型社区,以及产业规划有序的生态文明社会。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日益呈现出高度分工与合作的专业化生产和经营的社会体系,以及越来越规范和系统的治理装置和善治目标。这不仅早已超出传统乡贤的发展视野,也将深刻改变乡村社会的权威结构,匹配这种能力和素质要求的新乡贤将不可避免地活跃在乡村社会中。当前,随着国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域外精英和乡村精英的耦合共建正将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推向深入。这正是知识服务社会、能力创造价值的后喻文化时代的体现,也是新乡贤出场和活跃的必然要求。

乡村权威结构的扁平化发展,是乡村内生力量生成的体现,也是协同推进乡村建设的条件。前喻文化时代的乡贤,以自己的知识权威和政治威权构建金字塔般的权力结构,形成长老统治,发挥乡村治理的核

心作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步,不仅表现在生产和生活知识的深化,也表现在社会文化知识的转型升级;乡村教育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乡村知识生成和来源的路径,而且大幅度提高了青年农民的学习能力,特别是大规模的农民社会流动和移动通讯产品的普及,不仅扩大了农民交往范围和交往层次,更深刻地改变着农民的学习空间。随着乡村文化反哺现象不断深化和扩大,传统齿德并茂的乡村权威标杆已经松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利文化的扩散以及社会分化更是加剧了传统乡村权威的动摇,提前致富的村民以及走南闯北的乡村能人逐步成为乡村的意见领袖或乡村精英。农村话语权不断地在乡村“能人”中快速地转移,特别是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兴起,使得公共空间的权力层级扁平化,意见领袖的话语权不再巩固^[14],呈现为权威的碎片化^[15]。他们显然不是典型的传统乡贤,但他们的存在促进了乡村内生力量的生成,并为协同推进乡村建设准备了部分条件。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扎实推进必须破解乡村精英不足的瓶颈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而将农业农村现代化摆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也为广大农村亿万群众描绘了一幅立体、均衡、和谐发展的现代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以人民群众福祉为根本宗旨,也以人民群众共谋发展为根本推动力。这就必须要依靠人民群众思想、精神的振奋;必须要依靠人民群众人力和内在动力的激发;必须要做好人的文章,做大人的文章,做强人的文章。说到底,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才的振兴,痛点是人才的瓶颈。

“学农不择农”和“不学农”加剧乡村精英供给不足。百年来乡村精英的不足,既有乡村精英的不断退出和向城市的单程流动的原因,也有乡村外部精英补给无力的因素。近代以来,新式教育是乡村精英供给的主渠道,但却存在严重的“学农不择农”和“不学农”现象。据民国教育部1917年的调查显示,全国农校学生毕业后务农者仅占55%^[16]，“不学农”表现为1933年全国专科以上学生中农林科的学生是1413人,仅占学生总数的3.2%,占比最少,与此相对应的是教员只有192人,占全体教员的2.7%,也是占比最少的^[16]。21世纪,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开创了

新局面,但学农的大学毕业生中,65.8%都愿意选择国家机关、高校、科研院所,31.53%愿意到厂矿或企业,只有2.67%的毕业生愿意到农村去干一番事业^[16]。当前,“不学农”的状况也未见好转,据教育部公布的本科专业在校生统计,2015年农学在校本科生人数也仅增加到275293人,占当年全国本科各学科在校生总数的1.746%^①。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人才培养的主渠道,如果“学农不择农”和“不学农”两个问题解决不力,势必会长期影响支撑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人才的质与量,进而造成新的“尽管乡村运动,但乡村不动”的困境。乡村振兴首先是人才的振兴,人才的振兴必须要从“一懂二爱”的人才队伍建设抓起,更要从“学农不择农”和“不学农”的源头抓起,从根本上改善乡村精英人才供给不足的瓶颈。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乡村人才质与量的瓶颈。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亿万农民描绘了美好的发展蓝图,但乡村振兴的人才困境在总量和结构上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从总量上看,据农业农村部课题组魏琦等人的研究,2016年底我国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约为1900万,较乡村就业人员总数占比不到5%^[17],而到2019年我国农村实用人才总量也仅突破2000万^[18],这对于更好满足农村社会全面进步需要的四类人才队伍尚有非常大的差距^[19]。从人才结构上说,我国农业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过往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组织安排、农产品市场开发能不能无缝对接现代农业,特别是如何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农产品价值链的延伸、精准农业、“农业+”等提效增质的发展举措无缝对接,都是农村现有人才结构必须直面的问题。当前,我国的乡村治理也处于村民自治走向定型和完善的关键时期,不仅需要一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复合型人才队伍,还需要塑造更多的新时代的组织能力强、学习能力好、善治需求高的农民。因此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乡村精英质与量的不足。

三、新乡贤的生成路径

新时代的乡贤应以能力为基础、造福乡里为依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国统计年鉴(1999)。

据、群众认可为准绳。对于乡贤,可以说学术界众说纷纭,并刻画了四个方面的要素:地域性的身份要素,即本土本乡之人;品德要素,即拥有同时代人所仰慕的道德品格;能力要素,即有出众的才干或学问;声望要素,即受乡人推崇和赞誉,享有崇高的声誉^[20]。应该说这四个维度较为全面地总结了乡贤的特质,但地域性是否应作为新乡贤的基本标准呢?从我国乡贤文化的产生看,乡贤未必总是与地域挂钩。中国传统的官绅文化非常强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而才有了苏堤,以纪念东坡之功,都江堰二王庙塑祭李冰父子。如果以地域为准,他们难得成为当地百姓千年拜颂的乡贤,但他们确实是杭州和蜀地黎民百姓千年认可的贤者。当前,乡村内生人才资源的不足已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瓶颈,乡村要主动为乡村发展广结善缘搭建桥梁,新乡贤也应该突破地域,进行重新定义,正如学者萧子扬和黄超所言:“新乡贤是对新时期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主体的高度概括,是指基于自我知觉和社会知觉,在后乡土中国背景下一切愿意为农村脱贫和农业振兴贡献自己力量,积极投身乡村治理和乡村事业的人^[21]。”应该说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村建设人才都是新时代的新乡贤。

1. 以教育为本,建构亲近乡土、热爱乡村、熟悉乡音的乡贤文化基础。近代以来,国治完整和城乡差别的不断扩大以及乡村的凋敝,推拉着乡村精英退出乡村。同时,新式教育的逆乡土性进一步营造了与乡村疏离的氛围,形成了对乡村落后刻板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分割的发展模式,更使农村群众在贫困和封闭中梦想改变农民的身份。改革开放后,农民工大量进城,留守的农二代和农三代充满着早日进城与父母团聚的渴望,而跟着父母进了城的农二代和农三代则长久地脱离了与土地的联系,只剩下一纸农村户口还保留着与乡村的联系。很难想象一个盼望早日离开农村的孩子和一个没有农村概念的孩子,真正能有一份乡土情,愿意为农村的发展回归农村。因而,必须站在中华民族赓续先贤前辈的集体记忆、守护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之根的立场上^[22],推进乡土文化教育,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塑造大众对乡村、乡土根的归属感;在国民教育中,增加乡土民族价值观教育,而不是单向度的工业化教育,使青年后辈保持对乡村的天

然亲近而不是后天的疏离;为愿意建业乡村的精英人才培养基,使乡村成为大众成就事业、成就人生的沃土。让乡贤文化在文化教育中根植、在文化振兴中出彩、在事业成就中勃发。

以党和国家农村工作制度为平台,将大学生村官、退伍军人村官、驻村干部制度扎实推进,型塑为新时代的乡贤制度。农村工作队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推进农村工作、发动农民、贯彻党和政府的意图进行的制度创新^[23]。新的历史时期,为进一步推动农村发展,解决农村发展中的困难,党和政府又先后推进了驻村干部制度、大学生村官制度和退伍军人村官制度,这些制度总体让农村受益显著,较好地达到了制度设计的初衷。驻村干部、青年大学生和退伍军人在农村的广阔天地施展了自己的才华,丰富了自己的人生,实现了个人事业和农村发展的双赢。他们中涌现出了如优秀驻村干部沈浩、全国首届优秀大学生村官周倍良、最美退伍军人村官于来政等先进人物,深刻诠释了新时代新乡贤的精神特质。当前,这些制度在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正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目前仍然存在人才难以扎根乡村的问题,因而,在总结这些制度过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应探索将职业和志趣相结合,制度化地推进人才下乡工程建设,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以来人才从农村到城市的单程流动状况;以人才下乡为牵引,从根本上改变乡村其他资源净流出的现状,为乡村振兴提供全面持久的发展动力。

2. 以地域搭桥,以乡愁、乡音、乡缘吸引多元化非体制精英助力乡村振兴^[24]。中华文化具有浓厚的乡土意识和乡土观念,造福桑梓就是代表性的观念。古往今来全国各地都有爱乡爱土人士回馈乡里的佳话。如邵逸夫给内地多所大学捐建图书馆、李嘉诚捐建汕头大学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推动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数以亿计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应该说他们很多都曾都是乡村精英。他们在建设城市的同时,也不断形成和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这些都为他们为家乡发展“提供一条思路、开启一点民智、拓展一方言路”准备了条件。因此,通过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同学会”“同乡会”“团拜会”等活动,以及建设乡贤馆、乡贤祠等场所,有效地汇聚民

智、凝聚民力,推进乡村建设。

3. 以乡村资源为媒,积极吸引域外资本和精英群体投入乡村建设,倒逼乡村治理走向善治。我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乡村资源不能转化为现实利益,不能从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如我国广西巴马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长寿之乡,但以前由于信息闭塞,以及老百姓缺乏资源意识,巴马并不为人所知。随着地方调查的深入和网络力量的深入推送,巴马地区逐步成为投资的热土。据中新网的消息,近年来,巴马发展“三产融合”大健康产业,使天然饮用水、长寿食品、健康医养、精品体育、生物科技、特色医药等成为特色产业。推动广西首个基金小镇和数字小镇落户巴马,巴马被打造成为大健康的产业高地^[25]。资本下乡不仅助推了地方经济,实现了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伸和建构了农村产业链,提高了农产品的价值,培育了农村品牌农产品,更以资本为纽带将农村稀缺的精英人才配置到了乡村,形成了精英人才链条。这些精英人才不仅为乡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为乡村的移风易俗发挥着涓流的作用,特别是一些来自发达地区的资本,由于长期在规范和便捷高效的市场环境和政府环境下运作,具有较强和自觉的规范运作意识,他们对当地投资软环境的要求、对政府廉洁高效的体制要求都会对当地形成明确的倒逼作用,进而影响到乡村治理,从而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实现善治的目标。

4. 树立“麻雀”意识,广泛吸引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外智解剖“麻雀”,促进乡村建设。当前,我国已形成了多层次的政府扶持“三农”体系和非政府的扶持“三农”组织,共同推进“三农”工作且效果显著。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发展条件参差不齐,目前仍有许多乡村亟需借外力、外智助力发展。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在这种需求不能满足的同时,却有许多有志于扶持“三农”的精英人才及组织找不到帮扶对象,而出现扶持对象不足的问题。这就要求我国边远贫困地区的乡村,要勇于和善于当“麻雀”,积极将自己推介出去,吸引外智,成为乡贤解剖的“麻雀”,共建幸福乡村,而不是单纯依靠政府,坐等其他外智组织上门。例如,我国一些高校及研究机构都是精英人才

密集的组织,他们有人力资本、有课题等资源,但却经常发愁找不到合适的研究对象,一些乡村如能主动出击,吸引这些外智成为新乡贤助力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无疑将形成双赢的局面。

综上,乡村振兴需要新乡贤的出场。新乡贤应以自己的乡土情怀和能力造福乡里,成为群众认可的开放精英。为促进新乡贤的生成要积极树立亲近乡土的文化观念,建立下乡工作队伍人才体系,规范引导社会资本下乡,倡导乡贤文化,积极吸引外智社会组织和个人服务乡村振兴。新乡贤的本质既是知识创造价值的时代体现,也是能力本位的时代体现。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玛格丽特·米德. 文化与承诺[M]. 周晓虹,周怡,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目录页.
- [3] 王先明. 试论城乡背离化进程中的乡村危机——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问题的辨析[J]. 近代史研究,2013(3):44-59.
- [4] 梁簌溟全集(第2卷)[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573.
- [5] 许涤新,吴成明.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35.
- [6] 徐秀丽,王先明. 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1.
- [7]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 王福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28.
- [8] 王先明. 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64.
- [9] 徐秀丽. 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10] 刘奇. 走出“乡仇”走进“乡愁”[J]. 中国发展观察,2018(2):42-43.
- [11] 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M].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251.
- [12] 陈康甫. 卫家庄村学工作之自白[J]. 乡村建设旬刊,1935,4(29):5-11.
- [13] 李星三. 邹平十一十二两乡学新的工作发动之第一封信[J]. 乡村建设半月刊,1935,5(6):57-63.

- [14] 刘宇航. 乡土传统与传播技术的协商——互联网时代乡村社会交往的思考[J]. 青年记者, 2016(4): 134-135.
- [15] 刘奇. 中国乡土社会正在发生十大转变[J]. 管理观察, 2019(6): 14-15.
- [16] 朱绍友. 农科院校毕业生“学农不择农”现象的调查与研究[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5): 79-81.
- [17] 魏琦, 高鸣, 任倩, 等. 农业农村人才振兴的路径[J]. 中国人才, 2018(10): 48-49.
- [18] 高云才. 全国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目前突破 2 000 万[N]. 人民日报, 2019-03-06(03).
- [19] 覃诚. 建好农业农村四类人才队伍[J]. 农村工作通讯, 2018(19): 50-51.
- [20] 郭立, 廖胜华. 试论现代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作用[J]. 新西部, 2018(12): 19-20.
- [21] 萧子扬, 黄超. 新乡贤: 后乡土中国农村脱贫与乡村振兴的社会知觉表征[J]. 农业经济, 2018(1): 74-76.
- [22] 戎章榕. 振兴乡村需要依托传统文化[N]. 福建日报, 2018-07-10(03).
- [23] 刘金海. 工作队: 当代中国农村工作的特殊组织及形式[J]. 中共党史研究, 2012(2): 50-59.
- [24] 任艳妮. 多元化乡村治理主体的治理资源优化配置研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2(2): 106-111.
- [25] 黄令妍. “世界长寿之乡”广西巴马打造大健康产业高地[EB/OL]. (2019-10-18)[2020-05-26]. <https://news.sina.com.cn/o/2019-10-18/doc-iicezzrr3094054.shtml>.

Research on the Triple Requirement and Generation of New Able Villagers Appearance

WEI Tongyi, SU Jiamin, WU Mingyuan

(Institute of Marxism,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071, China)

Abstract: The group of Able Villagers was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rural governance.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based on ethics was the deep soil in which Able Villagers were active. As the power of informal rules, the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he long-term flow away of Able Villagers in modern times leads to the lack of rural endogenous construction 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post cultural era needs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various rural elite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we need to solve the bottleneck of the shortage of rural elites from both quality and quantity, and build a platform for the emergence of new rural elites. The group of New Able Villagers is an open platform for elites to serve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ts essence is both an embodiment of era of knowledge and value creation, and an embodiment of era of competence based era.

Key words: new able villagers; rural governance; rural elite; rural revitalization

(责任编辑: 张洁)